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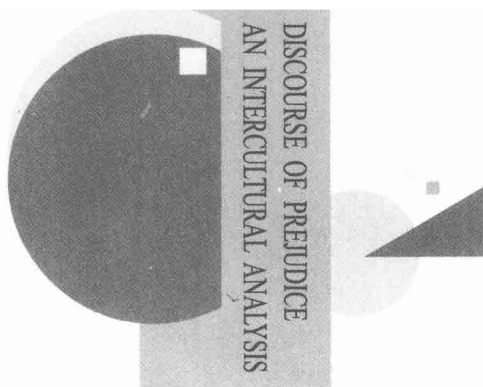


DISCOURSE OF PREJUDICE
AN INTERCULTURAL ANALYSIS

话语偏见的 跨文化分析



熊伟 / 著



话语偏见的 跨文化分析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话语偏见的跨文化分析/熊伟著.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1. 8
ISBN 978-7-307-08896-2

I. 话… II. 熊… III. 文化交流—研究 IV. G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29471 号

责任编辑: 谢群英 责任校对: 刘 欣 版式设计: 马 佳

出版发行: 武汉大学出版社 ·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cbs22@whu.edu.cn 网址: www.wdp.com.cn)

印刷: 湖北鄂东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20 × 1000 1/16 印张: 14.5 字数: 291 千字 插页: 1

版次: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7-08896-2/G · 2061 定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凡购我社的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序

人是说话的动物，通过说话与他人分享交流的意义和交流的自由，但话一出口就存在因话语偏见而“伤人”的危险，这是一件让人类沮丧的事情。于是，思想家们一直在尝试解构各式各样的话语偏见，如种族主义话语偏见、民族中心主义话语偏见、男权中心主义话语偏见、群体间话语偏见等。熊伟君博采众家之说而又另辟蹊径，在跨文化传播层面综合性地解析了跨文化语境中的话语偏见及其消解之道，形成了这部颇具创见的学术著作。对于处在多元文化互动时代而又深陷话语偏见困扰的人们来说，可以从这里获得某种可贵的启示。

海德格尔有句名言：语言是存在的家。以我的理解，“家”（haus）的比喻暗示了语言的悖论：它既澄明又遮蔽了存在，既显示又隐蔽了人的存在及其文化，表现出交流与不可交流的矛盾。语言既内化为人的思维方式、价值关系，又外化为人的语言规则、言语代码、交流方式等方面。这一方面意味着语言显示了无限可扩展的交流空间，或者说任何一种完备的语言所共有的语言能力或言语潜力，这使得一种语言能够翻译和解释其他语言中的任何一种表述，达成意义的分享；另一方面，语言的现实空间在很大程度上被具体文化的思维方式、价值关系所决定，由于文化的不可通约性，就难免发生意义的遮蔽。语言这种既“显”且“隐”的矛盾性表现的是人的矛盾性，人渴望交流与理解，生活在语言与言说的世界里，同时又把语言变成包裹自己的工具，使语言成为文化身份、意识形态、权力竞争的空间，不再是反映客观世界和内心思想的透明的媒介^①。话语作为使用中的语言很典型地表现着语言的悖论，由文化身份、意识形态、权力竞争等因素产生的偏见运行在日常语言之中，形成语言偏见，而语言偏见又反过来维护、再生着偏见，使偏见“脱口而出”，变得自然化、习惯化。人若要超越偏见，进入交流的自由之境，就必须面对这种如影随形的语言悖论。

事实上，很多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也难以摆脱这种语言悖论的束缚。以作者在书中提到的英国作家吉卜林（Joseph Rudyard Kipling）为例，这位周游世界的诗人感悟到隐含在日常话语中的“我们与他们”的二元对立，表达了超越互为他者、

① 单波：《跨文化传播的问题与可能性》，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44页。

互相敌视的良好愿望：“所有善良的人们都同意，/所有善良的人都说，/所有像我们一样的好人是‘我们’/其余的人们是‘他们’；/然而一旦你们穿洋越海，/而不是在路的那一边，/就不会再把‘我们’看作仅仅/是一群某种‘他们’！”可是，“我们与他们”的诗意表述只不过再现了文明与野蛮、光明与黑暗的西方式认知，这样一来，殖民者的优越感还是镶嵌在他的一些文学性的话语之中，如“他像东方人一样说谎”（He could lie like an Oriental，小说《吉姆》）、殖民地的人民通常是一半是恶魔一半是孩子（half-devil and half-child，诗歌《白人的负担》）。

就如同纸是包不住火的，语言也是包不住偏见的。社会心理学家对群体间语言偏见（linguistic intergroup bias）的不断验证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语言刺激既反映了又影响和引起了交流参与者的思维和认知内容，一个人不管如何深谙语言技巧，懂得用语言去掩饰自己的偏见，但是，语言还是会把潜藏在心灵深处的偏见显露无遗。比如，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话从某些人口中说出来：我不是种族主义者，但我认为要尊重我们之间的差异权；我对黑人没有偏见，但的确很多犯罪事件与他们相关；我并不认为伊斯兰教是恐怖宗教，但那些信徒确实参与了恐怖活动。这类话语极尽掩饰之技巧，但话语结构还是把说话者的意识形态和偏见显示在每一个听者面前。正是因为语言的这一特点，才构成了我们研究语言偏见的可能性。

早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奥尔波特（G. W. Allport）就发现了存在于群体间交往中的语言偏见现象，根据他的观点，语言可以微妙地反映人们的思维结构，特别是在内群体对待外群体的时候，我们可以从语言中看到内群体对外群体的刻板印象或对内群体的偏爱^①。意大利心理学家安妮·马斯（Maass, Salvi, Arcuri & Semin, 1989）等人循此提出群体间语言偏见（linguistic intergroup bias）理论^②，认为在群体间交往的语境下，当遇到与关涉内-外群体的预设观念不一致的信息时，语言的使用体现着刻板印象的痕迹。当描述一个内群体成员的积极行为或外群体成员的消极行为时，人们往往使用更为抽象的语言；而当提起内群体成员的消极行为或外群体成员的积极行为时，人们则使用更加具体的语言。这一理论把研究语言偏见的可能性变成了可操作的心理学方案，即在群体间交往的语境下，测量认知他者、传播刻板印象的心理过程与信息的语言表达形式之间的互动关系，由此形成了一个总体性的见解：群体间既存的偏见导致了偏见语言的使用，反过来，偏见语言的使用又巩固和维护了既存的偏见。熊伟君通过细密的梳理，完整地把握了这一理论的思维框架，同时也敏锐地察觉到其中的不足，如局限于词汇的具体-

① Allport, G. W. *The Nature of Prejudice*.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1954.

② Maass, Anne, and Daniela Salvi. "Language Use in Intergroup Contexts: The Linguistic Intergroup Bia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 57, No. 6, 1989.

抽象度来表征群体间语言偏见，不能结合文本的整体结构、具体语境、传受双方的身份、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因素分析；对语言偏见产生的原因解释不足，未能触及更为深层的社会文化原因，特别是未能考虑到内群体和外群体之间的不平等权力关系对语言偏见的影响；注意到了不同的语言偏见形式对接受者认知的影响，但忽略了接受者的批判性解读。这种理论反思意味着群体间语言偏见研究的跨文化转向，即从语言抽象程度转向跨文化交流语境，更深入地揭示话语（作为使用中的语言）是如何微妙地表达偏见的。相应地，心理学分析路径换成了批评性话语分析方法，即以诺曼·费尔克拉夫（Norman Fairclough）的三维批评性话语分析理论为基础，着眼于文本分析（语言形式特征分析）、话语分析（生产和接受过程分析）、批评分析（社会文化语境分析），从而揭示隐蔽性的语言策略所表现出来的偏见。显然，这种转换将构成对群体间语言偏见理论的有益补充。

顺着这种研究路径，作者让我们感知到，在文本分析层面，语言可以通过各种策略（词汇、语法、篇章等）间接、微妙和策略地反映、建构和维护偏见；在话语的生产与接受的实践层面，话语偏见不仅与文本的生产者有关，还与接受者解读文本的方式有关；在社会文化语境层面，话语偏见的生产与理解过程，以及文本的语言形式特征还受到更为宏观的社会文化语境的影响和制约，如意识形态（如东方主义）和权力关系（不平等的传播权力，反过来它们又维护和巩固了既存的不平等权力关系。这些分析深刻地揭示了一个事实：人与人之间、群体之间的话语实践常常为权力关系所架构，人们很难拥有产生互惠性理解的对话机会，当这种情况持续发生的时候，某些弱势的语言群体要么因发现自己原有的身份被社会所贬低，而使对话偏向消极效应（如偏见、不信任和冲突），要么被强势语言群体所支配而丧失自我语言的表达能力。这就是我们常常担忧的话语权的丧失，既失去对话能力，又失去说话能力。

面对人的语言困境，作者基于语言与社会的互动关系，试图从语言对社会的作用力上做文章，以寻求策略性改变。他导入费尔克拉夫的“解放的话语”（emancipatory discourse）概念，即干扰和打断既存的意识形态话语的“常识”性，打破常规，改变现有的话语秩序，使之“去自然化”（denaturalized）和“陌生化”（defamiliarized）。以本人的观察，这其实是有成功的先例的，墨西哥恰帕斯州的印第安原住民的信息化游击运动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那里的人们用语言改变命运，将自己化为了一个叫做“萨帕提斯塔（Zapatista）”的符号——这个符号代表着他们对现实社会的控诉、对生存权利的渴望、对社会认同和身份认同的诉求——他们称这个符号是为全世界的边缘群体所共同创建的，无论你在世界的哪个角落，人人都是萨帕提斯塔，他们由此建构了印第安人的身份认同，而且把它扩展为全世界边缘群体的身份认同。更使人瞩目的是，他们并不仅仅局限于守住印第安文化或玛雅

文化，而是形成了改变生存处境的积极的沟通策略^①：“我们必须说话，而且要让别人听到。如果我们现在不这样做，别人会替我们说，谎言就会不由自主地从他们的嘴巴里说出来。必须找到说我们自己的话的途径，说给那些想听的人。”他们通过这种策略冲破了英语的牢笼，部分突破了“被英语说”的格局，同时也解放了自身被方言分割的语言空间，使之成为内群体沟通和群体间沟通的力量。这其实就是后殖民主义的“反话语”策略，即发展文本策略，寻找对话空间，消耗主流话语的偏见，找回自己遗失的说话能力。

当然，每一种理论建构都会存在自身的偏向与缺失，这本书也不例外。作者所依赖的批评性话语分析路径，强调反思语言使用中的社会不平等，认为语言使用具有建构性、历史性、社会性和政治性，受到历史、社会、权力、意识形态的影响，试图解释语言偏见生成的社会文化条件以及在权力斗争中的作用。这使得作者偏重于宏观层面的反思，忽略了对语言偏见的心理学分析成果的吸收与转化，这样一来，对语言偏见的分析常常停留于抽象的层面，难以形成面向事实本身、面向语言意识本身的现象直观。一般说来，理论的姿态就是“全神贯注地看”，实际上，所有的科学方法都是在创造一种看的方式，虽然各种看的方式难免相互矛盾，但我们并不能因此偏向一隅，而是要解放看的方式，创造新的方法。如果作者能给批评性话语分析注入现象直观的内容，更多地关注日常话语实践的案例而非偏重于政治性话语实践，也许能为话语偏见的跨文化分析打开更广阔的理论视野。

熊伟君乃仁厚君子，身处权力纷争、偏见丛生的世界，心忧文化冲突、权力宰制，向往理解与沟通、信任与合作的跨文化理想，为此而沉潜于跨文化传播领域，心无旁骛，殚精竭虑，深造而自得之，实现了为人与为学的合一，为学界诸君所称道。作为他的朋友，我真诚地祝福他永葆学人本色，乘着跨文化理想的翅膀，跃上学术新高度。

是为序。

单 波

2011年盛夏于珞珈山

^① 参见（美）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第二版），曹荣湘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85页。

中文摘要

偏见是跨文化传播的主要障碍之一，也是跨文化传播学研究的重要问题。在不同的文化群体间，由于认知、动机、社会文化等原因而产生的偏见表现在语言中就形成了语言偏见，而语言偏见反过来又维护和再生了偏见。在当今的跨文化传播活动中，显性的语言偏见依然存在，但大量的语言偏见却是隐性的。隐性的语言偏见由于其表达的策略性和微妙性，且与意识形态和权力勾连在一起，不知不觉地影响着人们的感知、态度和行为。所以，跨文化传播中的这种“自然化”和“习惯化”的语言偏见更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很遗憾的是，目前跨文化传播学对此还缺乏系统的、深入的研究。

现有的关于语言是如何微妙地表征偏见的研究，主要是由一些西方社会心理学家从心理语言学角度，以及一些语言学家从话语分析的角度展开的研究。他们的研究成果对跨文化传播的话语偏见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然而也存在着种种不足之处。

传统的跨文化传播学对偏见的研究主要是吸取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成果，笔者认为，除此以外，还应从解释学角度来理解偏见，以及将偏见置于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的框架中进行考察（见本书第一章）。由于话语、意识形态和权力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这又启示着笔者从批评性话语分析的角度去研究跨文化传播的话语偏见问题。经过梳理比较，笔者认为，诺曼·费尔克拉夫提出的三维批评性话语分析理论和方法，为系统和深入研究跨文化传播的话语偏见提供了一种新的路径（见第二章）。他的理论融微观的文本分析和宏观的社会文化分析于一体，旨在揭示文本中所隐藏的意识形态意义，特别是那些人们习焉不察的偏见、歧视和对事实的歪曲，并解释它们存在的社会文化条件，以及在权力斗争中的作用。本研究拟将他的批评性话语分析理论和方法与其他相关理论结合起来，以三个话语维度为基本架构，即文本分析、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来透视跨文化传播的话语偏见问题。文本分析是对偏见表达的各种语言策略进行分析（见第三章）；在话语实践的维度里，将在文本的生产和理解的过程中考察话语偏见（见第四章）；在社会实践维度里，将分析话语偏见与社会文化语境（意识形态、权力关系）之间的互动关系（见第五章）。此外，本研究还提出，将批评性话语分析中的“解放的话语”与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的“反话语”策略结合起来探讨消减跨文化话语偏见的方法和

策略，以促进偏见本身的消解（见第六章）。

需要指出的是，批评性话语分析拥有多个分支，并没有统一的理论和方法。本研究虽然以费尔克拉夫的三维批评性话语分析为理论基础，但同时也吸收了其他一些批评性话语分析分支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另外，本研究还综合运用了语言范畴模式理论、群体间语言偏见理论、解释学理论、符号学理论、文化研究、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理论、文化帝国主义理论等。在整合这些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本研究还结合多个具体案例来展示如何对跨文化传播的话语偏见进行批评性分析。

总的说来，本研究是一个多学科和跨学科的研究，也是一个理论探讨型和实际应用型相结合的研究。

关键词：跨文化传播 话语偏见 批评性话语分析 意识形态 权力

Abstract

Prejudice is one of the major obstacles i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s well as an important issue in the study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Prejudice, between different cultural groups, mainly results from the cognitive, motivational and social-cultural causes. When prejudice is reflected in language, linguistic bias occurs, and in return, linguistic bias helps maintain and reproduce prejudice. In current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s, the explicit linguistic bias still exists; however, a large amount of linguistic bias is implicit. The implicit linguistic bias, due to its strategic and subtle representation, and entangled with ideology and power, unconsciously exerts influence on people's perception, attitude and behaviors. Therefore, this naturalized, habitualized linguistic bias deserves our special attention and thorough research. Unfortunately, the systematic and in-depth research still lacks in this area.

In fact, the researches on how language subtly represents prejudice have already been carried out by some western social psychologis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sycholinguistics, and by some linguists from the angle of discourse analysis. Although their researches are of great benefits to the study of discourse prejudice i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ere still exist some limitations.

The research of prejudice in traditional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udy has drawn heavily on the research of socio-psychology. In addition to which, this book holds that, prejudice should also be examined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hermeneutics, and under the context of ideology and power (Chapter One). The intricate relationships among discourse, ideology and power inspire the author of this book to study the issue of discourse prejudi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DA). After careful comparison and contrast, the author of this book believes that the three-dimensional CDA theory and methodology put forward by Norman Fairclough can provide a new approach for the research of discourse prejudice i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hapter Two). His theory integrates the micro textual analysis with macro social-cultural analysis to expose the hidden ideological meaning in texts, in particular, those matters of prejudice, discrimination and distortion, and explain the social-cultural conditions of

their existence and the role in power struggle.

This research attempts to combine Fairclough's theory with other relevant theories to investigate the issue of discourse prejudice i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three dimensions: textual analysis, discursive practice and social practice. In textual analysis, the various linguistic strategies for prejudiced communication will be analyzed (Chapter Three); in discursive practice, the prejudice discourse will be examined in the process of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Chapter Four); in social practic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prejudice discourse and social cultural context (ideology and power relationship) will be studied (Chapter Five). Finally, this research proposes to connect the "liberation discourse" in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with the "counter discourse" in postcolonial study to explore the possible ways to reduce the prejudice discourse, and then the prejudice itself (Chapter Six).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there is no single or unified theory and methodology of CDA. Based on Fairclough's theory, this research also absorbs some relevant theories and methods from other branches of CDA. Moreover, more theories such as Linguistic Category Model, Linguistic Intergroup Bias Theory, Hermeneutics, Semiotics, Culture Study, Postcolonial Study, Cultural Imperialism, etc., are also incorporated into this research. With these theories, a couple of cases concerning the discourse prejudice i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re analyzed.

To sum up, this research is a multi-discipline and cross-discipline research, which attaches importance to both the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and the practical usage.

Key Words: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Discourse Prejudice,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Ideology, Power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节 研究问题的提出	1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回顾	9
一、群体间语言偏见理论	10
二、语言偏见的话语分析	28
第三节 本研究的目标与价值	38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框架	40
第一章 跨文化传播的偏见研究概述	44
第一节 关于“偏见”	44
一、“偏见”探源	45
二、“偏见”再思考	48
第二节 偏见的特征、形式与功能	51
一、偏见的特征	51
二、偏见的形式	52
三、偏见的功能	57
第三节 偏见的成因	58
一、偏见产生的认知原因	58
二、偏见产生的动机原因	64
三、偏见产生的社会文化原因	66
第四节 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解释框架中的偏见	67
一、意识形态与偏见	67
二、权力关系与偏见	68
小 结	69
第二章 批评性话语分析:跨文化话语偏见研究的新路径	70
第一节 批评性话语分析兴起的背景与特征	70
一、批评性话语分析兴起的背景	70

二、批评性话语分析的特征·····	75
第二节 批评性话语分析的语言学基础·····	76
一、萨丕尔—沃尔夫假设·····	76
二、系统功能语言学·····	81
第三节 批评性话语分析的核心思想·····	82
一、作为社会实践的话语·····	83
二、话语与意识形态·····	85
三、话语与权力·····	87
第四节 批评性话语分析的原则、方法与对象·····	91
一、批评性话语分析的原则·····	91
二、批评性话语分析的方法·····	92
三、批评性话语分析的对象·····	94
四、对批评性话语分析的批评·····	95
第五节 批评性话语分析与跨文化话语偏见研究·····	99
小 结·····	100
 第三章 跨文化传播的话语偏见:语言表达策略·····	101
第一节 跨文化话语偏见的词汇表达策略·····	102
一、词汇选择·····	102
二、隐喻·····	113
三、案例分析:从“黄祸”到“中国威胁论”的隐喻性话语·····	117
第二节 跨文化话语偏见的语法分析·····	120
一、及物性·····	121
二、情态·····	126
三、案例分析:“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哪里?·····	129
第三节 跨文化话语偏见的语篇结构分析·····	138
一、框架理论与话语偏见分析·····	138
二、新闻话语结构与话语偏见分析·····	141
小 结·····	145
 第四章 跨文化传播的话语偏见:生产与理解·····	146
第一节 媒介控制与话语偏见的生产机制·····	148
一、媒介功能·····	148
二、新闻价值观·····	151
三、议程设置·····	157

第二节 互文性与跨文化话语偏见·····	161
一、互文性概述·····	161
二、互文性与批评性话语分析·····	162
三、话语描述与跨文化话语偏见·····	165
小 结·····	171
 第五章 跨文化传播的话语偏见:社会文化语境·····	172
第一节 大众传播权力·····	173
一、“多义”与“多面”的权力·····	173
二、大众传播媒介权力的特征·····	179
第二节 不平等、不平衡的国际传播秩序与跨文化话语偏见·····	181
一、不平等、不平衡的国际传播秩序即不平等、不平衡的传播权力·····	181
二、不平等、不平衡的传播权力与跨文化话语偏见·····	185
第三节 意识形态与跨文化话语偏见·····	188
一、意识形态与权力·····	188
二、东方主义意识形态与跨文化话语偏见·····	190
第四节 文化帝国主义与跨文化话语偏见·····	194
一、文化帝国主义与权力·····	194
二、文化帝国主义与话语偏见的生产和传播·····	200
小 结·····	202
 第六章 跨文化话语偏见的消减:反话语策略(代结语)·····	203
第一节 批评性话语分析的“解放话语”·····	204
第二节 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的“反话语”策略·····	207
第三节 反话语策略与跨文化话语偏见的消减·····	209
 参考文献·····	213

绪 论

第一节 研究问题的提出

纵观人类漫长的跨文化交流史，我们可以发现：偏见，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偏见，一直与差异同在，与人类同行；偏见，扭曲事实，制造隔阂，引发歧视、敌视乃至冲突和战争。这一切都促使人们去深刻反思偏见产生的根源和表达的形式，以尽量减少不同文化群体间的偏见，促进人们之间的相互理解和沟通。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 2001 年发表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n Cultural Diversity) 中将文化定义为：“某个社会或社会群体特有的精神与物质、智力与情感方面的不同特点之总和；除了艺术和文学之外，还包括生活方式、共同生活准则、价值观体系、传统和信仰。”从这个定义中，我们不难推论出文化通常与种族、民族或国家捆绑在一起，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产生排他性的“我们”和“他们”。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差异产生了“我们”和“他们”，而有了“我们”和“他们”也就有可能产生偏见，因为人们总是透过各自的文化“棱镜”去相互审视，而透过“棱镜”的折射使理解难免要发生偏差。对此，英国著名诗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罗德雅德·吉卜林 (Rudyard Kiplin, 1865—1936) 在一首题为《我们与他们》(We and They) 的诗中，做了一番生动形象的描绘。^①

① 父亲、母亲和我，/姐姐和姑姑说/所有像我们的人是“我们”，/其余的人是“他们”。/“他们”生活在海那边/“我们”生活在路这边/但是——你相信吗？——他们将我们仅仅看作/是一群某种“他们”！

我们用牛角柄的刀叉吃猪肉牛肉。/吞吃棕叶包饭的他们/吓得要死；/栖居在树上以幼虫和黏土为盛宴的“他们”/（这不让人感到震惊吗？）将“我们”看作/是一群简单的、令人厌恶的“他们”！

我们吃厨房烹制的食物。/我们使用有门闩的门。/他们在无顶的茅屋下/喝牛奶和鲜血。/我们付钱去看医生/他们出钱去请巫医/（多么粗鲁的异教徒！）他们将“我们”看作/是一群无可救药的“他们”！

所有善良的人们都同意，/所有善良的人都说，/所有像我们一样的好人是“我们”/其余的人们是“他们”；/然而一旦你们穿洋越海，/而不是在路的那一边，/就不会再把（想想它吧！）“我们”看作仅仅/是一群某种“他们”！

吉卜林以内嵌于西方理性中的二元对立逻辑，抽取若干文化侧面（饮食、起居、医疗和宗教）来描绘互为他者的“我们”和“他们”。从表面来看，两种文化相互用极富偏见的语句来描述他们之间的差异：“他们”将“我们”视为“令人厌恶的”（disgusting）、“无可救药的”（impossible）异类；另一方面，“我们”也认为“他们”“令人感到震惊”（scandalous），是“粗鲁的异教徒”（impudent heathen）。“我们”与“他们”互为他者，互存偏见。虽然在结尾处，诗人表达了良好的跨文化沟通愿望，“不会再把‘我们’看作仅仅是一群某种‘他们’”，但是在文化相对主义的面具后面，隐藏的其实还是欧洲种族中心主义和欧洲优越论。

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的奠基人爱德华·W. 萨义德（Edward W. Said）对这种“我们”与“他们”之间所存的偏见有一个宿命式的论断：“在五百年来的欧洲人和‘其他人’之间的有规律的交流中，一个几乎没有一点改变的观念就是，有一个‘我们’和‘他们’，两个方面都是固定、清楚、无懈可击的，不言自明的。就像我在《东方学》中所说的那样，这种划分始于希腊时期关于野蛮人的概念。”^①“野蛮人”的英文单词 barbarian 中有一个源自希腊语 barbarikos 的词根 barbar，意思是重复发出含混不清、意义不明的声音。在古希腊文明的黄金时代，说希腊语的人被认为是“有教养的”（cultured）和“健谈的”（eloquent），而那些不会说希腊语的人则被看作是“野蛮人”（barbarikos）。按此逻辑，“野蛮人”这个概念又是天然相对的，“我们”每个人在“他们”的眼中其实都是“野蛮人”，其衡量的标准就是会不会清楚地说对方的语言。正如拉斯·卡萨斯所言：

因为一个人说话的方式陌生，因为他讲其他人的语言时发音很糟，所以他和另一个人比较起来就被称作野蛮人……这是希腊人称其他民族为野蛮人的主要原因……因为他们希腊语的发音不准确。但是依此观点，没有哪个人或哪个种族相对于另一个人或另一个民族不是野蛮人的。^②

由此可见，“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偏见是相互和共生的，其差异化、范畴化、刻板化和优劣化经常被具有魔咒的语言贴上了标签，从而变得凝固化和持久化。

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则从解释学（Hermeneutics）角度指出了“偏见”的历史必然性。他认为，从本质上讲既然一切理解过程都裹挟

① [美] 爱德华·W. 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版，“前言”，第21页。

② 转引自戴维·莫利，凯文·罗宾斯：《认同的空间》，司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95页。

着解释者的个人视域、经验体悟、当时的情境背景和置身其中的历史文化传统等因素，那么历史中的人和他的理性就不可能摆脱偏见的困扰，偏见是人在历史中的存在。他还认为，虽然误解和偏见不可避免且无法根除，但偏见并不总是消极的，偏见的存在说明人类理解活动的局限性和历史性。从某种意义上讲，偏见是理解的基础，没有偏见，也就没有理解。在跨文化交流过程中，偏见固然制造了沟通的障碍，但其何尝又不是相互理解的基础呢？

在全球化的当今世界，虽然通讯和交通工具的现代化、经济的全球化和人口的大量迁移带来了时空的高度紧缩，却难以缩短“地球村”中文化背景迥异的“村民”之间的心理距离，常令他们徒生“咫尺天涯”和“交流的无奈”之感。由此可见，偏见并不因时空的紧缩和接触的频繁而自动消弥。相反，由偏见引起的歧视、仇视、冲突乃至战争层出不穷，且有日益蔓延之势。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认为“文化和文化认同（它在最广泛的层面上是文明认同）形成了冷战后世界上的结合、分裂和冲突模式”。^① 该观点尽管毁誉参半，但不可否认的是，在现实世界中我们能够文化/文明间由偏见、歧视而导致的灾难找到越来越多的、血淋淋的例证。

简单来说，偏见是在与内群体相比较的基础上所产生的对外群体没有根据的、与事实不符的态度。偏见的持有者往往对偏见对象具有优越感或权力支配感。偏见在传播中或以明显，或以微妙的形式表现出来。拉斯彻（J. Ruscher）在总结偏见传播的研究时指出：

带有偏见或刻板印象的传播总是涉及刻板信念、偏见态度或歧视意图的或清晰或隐晦的表达。虽然偏见传播有极其明显的方式，如憎恨性的言论、歧视性的成文政策和极端象征主义（如纳粹党所用的曲十字标志），**但是大量的偏见传播是微妙的……**传播者并不总是能意识到这些行为所传达的信念：如外群体不值得过分关注，或仅仅是低劣而已，甚至表达出轻蔑或不信任之感。的确，如果不对个人是如何对待内群体成员和外群体成员进行直接比较的话，**旁观者就有可能意识不到反映偏见的微妙行为。**^②（黑体字为笔者所加。）

随着文明的进步、社会的发展、民主平等的弘扬、人权的尊重，明目张胆的偏见依然存在，但往往会激起偏见对象的抗议，甚至是暴力抗争，于是大量的偏见便转而以各种粉饰和微妙的方式有意或无意地表现出来。正如范·迪克（van Dijk）

① [美]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

② Ruscher, J. Prejudiced Communication. New York: Guilford, 2001, pp. 2-3.